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上海社科

#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

Journal of Ancient China Studies

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 编

第十九辑

Vol.1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

Journal of Ancient China Studies

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 编

第十九辑

Vol.1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十九辑/上海社会科学院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2018

ISBN 978-7-5520-2469-2

I. ①传… II. ①上… III. ①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9815 号

###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 第十九辑

---

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章斯睿

封面设计:黄婧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19.5

字 数:363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520-2469-2/K·471

定价: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委会

---

学术顾问：李 庆

主 编：司马朝军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四新	清华大学
王志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王承略	山东大学
宁镇疆	上海大学
邹振环	复旦大学
陈 致	澳门大学
陈才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陈文新	武汉大学
陈居渊	复旦大学
杨逢彬	上海大学
张 剑	北京大学
汪春泓	香港岭南大学
范金民	南京大学
林存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徐道彬	安徽大学
廖名春	清华大学

# 目 录

## 专稿

- 《礼运》首章再考辨 ..... 吴 飞/001

## 经子研究

- 江永《学庸图说》的整理与研究 ..... 徐道彬 杨 哲/021  
《论语·学而》“言可复也”新考 ..... 庞光华 李凤娥 吴 珺/049  
《四书评》平议 ..... 张昭炜/059

## 史学研究

- “太伯奔吴”再考 ..... 詹 刚/070
- 古书成书及流传问题研究
- 以马王堆帛书《阴阳脉死候》为中心 ..... 赵 争/083
-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市舶机构设置沿革与港口城市的发展
- 兼及从上海镇到上海县的发展历程 ..... 张晓东/096
- 毛奇龄年谱补遗 ..... 胡春丽/108
- 史家意识与方象瑛的散文创作 ..... 王 成/147
- 章太炎论宋学 ..... 王 锐/157

## 文献考证

- “轺车督邮”所乘的车 ..... 宫谷如/175
- 叶曾《东坡乐府序》校读记 ..... 朱兆虎/179
- 郑刚中《北山集》版本考 ..... 刘泽华 任 群/181
- 《书传会选》跋考释 ..... 宫云维 陶首江/192
- 《文选》李善注引《论语》及各家注考论 ..... 吴相锦/198
- 拟卦三续 ..... 陈开林/227
- 《文始》笺补遗 ..... 章太炎撰 骆鸿凯笺 王文晖、赵乾男整理/253
- 起黄(上) ..... 吴光耀撰 刘增光、刘晶晶整理/266

## 书评

十八年努力,勘破一部质量精湛的伪书

——《〈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评介 ..... 谢贵安/285

礼学纵深地带的风景

——邓声国《仪礼文献学》书后 ..... 陈绪平/288

吴仁安《明清史事与江南望族探微》评介 ..... 叶 舟/291

## 序跋

- 《孔子家语新证》序 ..... 李学勤/297
- 《〈流沙坠简〉考论》序 ..... 许建平/299
- 《隋书经籍志研究》序 ..... 王承略/303

## 《礼运》首章再考辨

□吴 飞

**摘 要:**《礼记·礼运》首章大同小康之辨,是现代中国思想中最受重视的《礼记》篇章,从康有为、郭沫若等以来,不断得到阐发;而对此篇的文本研究,随着相关出土文献的发掘,在现代学术中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出现了许多争论。本文首先清理了《礼运》的文本问题,认为虽然《孔子家语·礼运》未必是王肃所伪造,但其成书不会在小戴《礼记》之前,而其中的大同、小康之别仍然是成立的。但是,在义理诠释上,康有为以大同、小康附会公羊三世说,并以西方乌托邦思想进行诠释,却是完全误解了《礼运》首章的本义。按照礼学本身的脉络,大同之世并不是取消家庭、财产共有的时代,而是不需要特别制礼,人民也可以按照礼义行事的大质之时;小康也并不是所谓的阶级社会,而是在已经不再那么质朴之时,建立起来的理想礼制社会。我们需要从礼学本身的思路来理解大同、小康之辨,而不能牵强地附会于西方乌托邦思想。

**关键词:**礼运;大同;小康

**作者简介:**吴飞,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现代中国思想中,最受重视的《礼记》文本莫过于《礼运》一篇,尤其是其开篇的大同、小康之论,由于康有为、郭沫若等的创造性诠释,对百年来的中国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发掘以及对《孔子家语》的重新重视,人们对《礼运》文本的认识大为改观。在目前的学术界,康、郭那样的诠释方法已基本被抛弃了,但究竟该如何理解《礼运》一篇,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笔者认为,《礼运》虽然并没有康、郭等所认为的那种乌托邦思想,但其中仍然体现出关于礼的演进的重要问题,这在礼学思想中非常重要,而且与汉唐礼学的历史性理解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文就是理解《礼运》文本与义理的一个尝试。

### 一、《礼运》诠释中的问题

《礼运》作为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于刘向《别录》属“通论”。郑康成注:“《礼运》者,

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及阴阳旋转之道。”孔颖达对比《曾子问》和《礼运》说：“不以子游为篇目者，以曾子所问，事类既繁杂，不可以一理目篇，子游所问，唯论礼之运转之事，故以礼运为标目耳。”礼之变易，礼之运转，当然是礼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汉唐经学中，这是比较受重视的一篇礼学文献。但从宋代以后，却不时有人对它提出质疑。如北宋李清臣说：“尝观《礼运》，虽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与三代之治，其语尤杂而不伦。”他的质疑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以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为大同，以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为薄俗，而不以君臣父子之伦为永久不变；第二，认为人伦的确定是“起兵作谋贼乱之本”；第三，郑注引老子之言，薄礼而厚忠信。他自己认为：“有天地则有生民，有生民则有情欲，有情欲则有争夺，民与天地同时而生，情欲与民同时而生，事与情欲同时而生，故虽太古不能无事。”<sup>①</sup>即，不存在《礼运》中所谓的大同之世，礼与天地并。其后陆续有学者给出类似的批评，如石梁王氏<sup>②</sup>、陈澧等，虽并不完全同意李清臣的理解，但都认为《礼运》中的大同、小康之论混杂了老庄之说<sup>③</sup>，甚至梁漱溟都觉得，《礼运》一篇不符合孔子的思想。<sup>④</sup>而随着宋儒析出《大学》《中庸》两篇，《礼运》的地位更变得晦暗不明。

但在康有为之后，《礼运》的地位却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康氏 1884 年刊行的《〈礼运〉注》结合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乌托邦思想，认为《礼运》中的“大同”就是太平世，“三代之英”的“小康”就是升平世，而孔子自己生活的时代是据乱世。他说：“夫有国，有家，有己，则各有其界而自私之，其害公理而阻进化，甚矣！惟天为生人之本，人人皆天所生而直隶焉。凡隶天之下者皆公之，故不得立国界，以至强弱相争；并不得有家界，以至亲爱不广；且不得有身界，以至货力自为。”<sup>⑤</sup>后来在《大同书》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详尽描述了大同社会重消灭私有制、国家、家族等之后的状况。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继承了康氏的说法，将大同之世理解为盛行普纳路亚式母系婚姻制度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小康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之后的阶级社会。<sup>⑥</sup>两位先生所用的名词虽然不同，但以西方世界历史观来理解《礼运》的方法，却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两位先生对大同、小康的理解，也直接继承了李清臣以来的理解，即认为大同之世是一切公有、没有家庭，因而没有父子君臣之礼的，只不过因为立场和标准不同，他们没有像李清臣那样批评这一段，反而认为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

① 李清臣：《礼论（下）》，收入《宋文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8 卷，页 19a—21a。

② 据吴国武兄考证，此人名王时潜，号石梁。

③ 均见于陈澧：《礼记集说·礼运》。

④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0 页。

⑤ 康有为：《礼运注》，《康有为全集》第五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5 页。

⑥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牟宗三也非常重视《礼运》一篇,像康、郭二先生一样,他也试图用西学思想理解大同、小康之辨,只是认为大同之时的禅让制寄托着孔子类似于民主制的理想,而其经济方面的平等则有类于社会主义,小康之世则政权在私。但牟先生有一点不仅与二先生不同,且与李清臣以来的理解都不同,即,他并没有认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指的是没有家庭,因而没有父子之伦,否则如何解释“男有分,女有归”之意?二先生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困难,康说“归”为“岿”字之误,郭说这两句为后世窜入。但牟先生只是认为,这是配合经济、政治上平等的“普遍的德化意识”<sup>①</sup>,因为《礼运》中从来没有说过大同之世要取消家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并不意味着不亲其亲,不子其子。张横渠曾说:“既曰不独亲亲、子子,则固先亲其亲、子其子矣。”<sup>②</sup>牟先生显然深入分析了这一段的逻辑。

《礼运》本来的主题“礼之运转之事”,康、郭二先生完全忽略了这一点,非常牵强地附会于西方乌托邦思想。牟先生却没有忘记,这一篇的主题是“礼”,因而非常深入地分析其中所描述的礼的历史演进:“实则此只是人文历史开始具定形之发展。在此发展中,有礼以运之。故下文亟言‘礼之急’,言礼之最高意义及作用。此不但是言礼本身之进化,而实是由礼之运以观历史之发展也。礼代表人之精神、理想以及人类之价值观念。如是,礼之运即是历史之精神表现观也,即以精神表现、价值实现解析历史也。”<sup>③</sup>此说应该是杂糅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但牟先生借助于黑格尔的理论,却讲出了更加切合于《礼运》研究传统的理解,远比康、郭二先生贴切得多。

对于李清臣以来的质疑,牟先生也有很深的思考。应该是借鉴了康有为以来的历史哲学,他认为“大同之境界托始于尧舜,以为治平之道之最高理想,而此理想却并未实现于已有之历史中”,既然大同之世只是政治理想,而非实有的阶段,牟先生就不会像李清臣那样质疑文本的历史性叙述。他与李清臣一样,认为,“礼无时可缺,无时不须谨,即大同时亦然,且其实现与表现将更多。”<sup>④</sup>大同之世并不是一个没有家庭和礼制的时代,李氏的攻击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当然这误解也并非空穴来风,牟先生说:“于言三代小康之局时,措辞稍有不妥,或令人有可误会之处,此即‘谨于礼’一句之所表示者。在小康之局时,须谨于礼,则一方面礼似乎只是消极之意义,一方面似乎在大同时即可不须谨于礼。此即措辞不妥,而可误引也。”<sup>⑤</sup>

牟先生的这几段话非常重要,他不仅打破了《礼运》现代解读的固有模式,而且已经

①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② 张载:《礼记说·礼运》,已收入《张子全书》,林乐昌编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7页(从卫湜,《礼记集说》卷五十四辑出)。

③④⑤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11页。

触及了宋人以来对《礼运》的诸多误读。现代学者对《礼运》的理解,就肇始于宋人的误读。牟先生的重要修正,为我们重新解读《礼运》中的历史哲学,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 二、《礼运》的文本问题

对经典义理的理解离不开对其文本的正确诠释。自从宋人对《礼运》的思想提出质疑之后,清人进一步围绕《礼运》文本提出了质疑。

首先,邵懿辰提出《礼运》文本有错简,他说:“《礼运》一篇,先儒每叹其言之精,而不甚表彰者,以不知道章有错简,而疑其发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为己’之下,‘是故谋闭而不兴’之上,则文顺而意亦无病矣。”<sup>①</sup>邵懿辰的怀疑,仍然发端于李清臣的质疑,一方面,他很喜欢《礼运》一篇,不肯把它当成老氏之书;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李清臣等人的批评,于是通过改变文字顺序,来挽救《礼运》可能的道家倾向。今人徐仁甫和永良也都延续了邵懿辰的说法,认为此处有错简。<sup>②</sup>

此外,《礼运》中所记孔子与子游的对话,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如钱穆说:“考孔子年五十一为司寇,子游年六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孔子与语大同小康,有是理乎?后人犹有信《礼运》大同为真孔子当日之言者,皆坐不知论世考年之咎。”<sup>③</sup>这一立论的主要根据,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的,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基于这一理由,很多学者认为《礼运》是后人托名之作,而非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因而其中出现一些并非孔子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礼运》中论小康一段,多有学者疑其有错简。除邵懿辰提出的之外,任铭善又认为,“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应在“货力为己”之后,语义方顺畅。<sup>④</sup>

以上是前辈学者对《礼运》文本的主要疑问,虽然表面上看是错简与著作年代的问题,但实质上都对《礼运》义理的理解有密切关系。正是因为其义理不像儒家一般的说法,所以大家怀疑其中要么文本有问题,要么是伪托之作。

在《礼记·礼运》之外,《孔子家语》中也有《礼运》一篇,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孔子家

① 邵懿辰:《礼经通论·论〈礼运〉首段有错简》,皇清经解续编本第1277卷,页17b—20a。

② 徐仁甫:《〈礼记·礼运篇〉的误解与错简》,《晋阳学刊》,1985年第2期;永良:《〈礼记·礼运〉首段错简应当纠正》,《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第72—73页。

③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④ 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按》,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4页。

语》被认为是王肃根据各种文献缀集而成的伪书,其中的《礼运》篇是受《礼记·礼运》影响的。但近几十年来,由于大量简牍的出土,学术界对《孔子家语》的真伪展开了激烈争论,因而也牵涉《礼运》的文本研究,我们也因此可以重审《礼运》的义理问题。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竹简,<sup>①</sup>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也出土一批简牍,<sup>②</sup>均有与《说苑》《新序》《孔子家语》重合的不少内容。<sup>③</sup>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中也出现了与《礼记》和《孔子家语》相同的内容。<sup>④</sup>

但究竟应该如何解读这些简牍,学术界出现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李学勤、庞朴、杨朝明等均认为,这些简牍证明《孔子家语》并非伪书。最极端的观点以杨朝明为代表,认为《孔子家语》根本不是伪书,是孔子弟子直接记录的孔子言论,后经孔安国整理为今本,但因为种种缘故,几次献书均未成功,一直只在孔家内部流传,直到魏晋之际的孔猛,因为是王肃弟子,将书交给王肃,王肃为之作注,此书才得以广泛流传。<sup>⑤</sup>另有邬可晶博士,通过对《孔子家语》、出土文献、其他相关传世文献之间逐篇、逐段深入而详细的对比,证明《孔子家语》的文本都是在较早文献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且其中犯了很多错误,且根据对孔安国后序及孔衍上疏的仔细甄别,认为其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因而,今本《孔子家语》中的文献都有来源,而且不排除其中部分文本保存了较古老的资料,但就《孔子家语》全书而言,应该是魏晋时的孔猛所伪撰,王肃也应该知道这些情况,所以王肃伪撰《家语》的旧说仍然成立。<sup>⑥</sup>另外,宁镇疆就《孔子家语》也作了长期的研究,他的观点处于这两个极端说法之间,他认为,根据现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王肃作伪说已经被抛弃了,但他也不接受杨朝明所主张的《家语》直接来自孔子及其弟子的说法,他认为今本《家语》不是作伪成书,而是层累形成的,即历代学者根据较早文献,不断整理编辑而成书。在《家语》的流传过程中,孔安国的整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孔安国的整理水平又不是很高,所以造成了各种问题。<sup>⑦</sup>

以上就是目前学术界对《孔子家语》的三派看法,各有各的道理。笔者对《家语》全书没有上述各位学者那样深入的研究比对,不敢妄下判断,但认为可以确定如下几点:第

①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

② 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附录一《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一号木牍〈儒家者言〉章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③ 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④ 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

⑤ 参见杨朝明:《〈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前言,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35页。

⑥ 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考》,中西书局2015年版。

⑦ 宁镇疆:《〈孔子家语〉新证》,中西书局2017年版。

一,《家语》中的文献大多出自先秦时期,但难以确定是否系孔子及其弟子所作;第二,今本《家语》应该经过了两汉至魏晋历代学者的整理编辑,最终成型;第三,虽然不能如杨朝明那样,用《家语》的材料来修正《礼记》等传世文献,但可以将《家语》文本作为研究《礼记》文本的重要参考。而这三点,对我们进一步理解《礼运》的文本与义理,都有很大帮助。

首先,《孔子家语》中对孔子很多弟子年龄的记载都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同,特别是有一个系统性的不同,即《家语》中记载的弟子年龄,很多比《史记》中记载的大十岁,子游即为其中一位。卢梅经过比照和考证,认为《孔子家语》中的记载更恰当,《史记》中的记载要么是本来就有问题,要么是传抄过程中造成的讹误。<sup>①</sup>这样,按照《孔子家语》的记述,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而不是四十五岁,孔子做鲁司寇时,他已经是16~20岁的青年,从孔子游已经完全没有问题,则钱穆等人的质疑已经不再成立,《礼运》就有可能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内容,由子游记录下来的。<sup>②</sup>我以为,虽然不能确定《礼运》就是孔子与子游的真实对话,但确定为先秦较早的文献,应该是可以的。孔子弟子的年龄问题,有可能《家语》或其来源文献有比《史记》更早的资料来源,也有可能就是参照《史记》,但《史记》传抄讹误导致了现在的问题,虽然不能确定《家语》一定是对的,但像钱穆那样因为年龄问题而否定《礼运》,已经无法成立了。

经过学者们对《孔子家语》的重新研究,我们更可以重新比照《孔子家语·礼运》来研究《礼记·礼运》文本。两个版本孰先孰后,历来有不少争论。范家相的《家语证伪》与孙志祖的《家语疏证》都认为,是《家语》抄袭了《礼记》。<sup>③</sup>但也有人认为是小戴本有后人掺入的成分,应该以《家语》校正,《钦定礼记义疏》、任启运、姜兆锡、日本人武内义雄都这么认为。<sup>④</sup>杨朝明及其弟子卢梅等认为,两者相比,《礼记》中的文本也保留了一些可修正《孔子家语》文本的字句,但总体而言,《孔子家语·礼运》的文本应该比《礼记·礼运》更早,《礼记·礼运》是小戴编入《礼记》时做了修改的,因而加入了原文中所没有的一些内容,最主要的是,将“小康”之说加了进去,结果对后世影响巨大。按照《孔子家语》中的文本,大同之世与三代之英并无不同,没有“大同”与“小康”的区别,郑康成之后将大同理解为五帝之世,小康理解为三代之世,是受到小戴本误导而形成的错误。笔者并不认为是小戴本抄袭了《家语》本,但他们的研究成果足以纠正李清臣以来,认为《礼运》是伪作,或其中混

① 卢梅:《〈礼运篇〉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4—15页。

②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第26—27页。

③ 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七,《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9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孙志祖:《家语疏证》,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931册,第229页。

④ 《钦定礼记义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卷。

入了道家思想的说法,更否定了康有为以来的理解。不过,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礼运》的两个版本,以及如何理解其中表达的历史观,笔者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邬可晶对两个版本的详细对比证明,《家语》本是后出的,比较可信。<sup>①</sup>即使我们接受杨朝明和宁镇疆的说法,认为今本《孔子家语》虽并不都是王肃伪造,但其中包含了汉人的整理与增删,是两位先生也并不完全否定的事实。所以,两篇《礼运》之间的差异,不一定是因为《家语》本更接近原本,小戴本更为晚出。当然,大小戴编辑《礼记》时,对各篇常有修改增删,这也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今所见《小戴礼记》,更加上郑康成所作的整理诠释。可以说,两篇《礼运》同源於秘府所藏《孔子家语》,我们今天所见的《礼记·礼运》文本及诠释,乃是经小戴整理、郑康成诠释的本子,而《孔子家语·礼运》,则是可能经孔安国或孔猛整理、王肃诠释的本子。在一定程度上,两个本子之间的比较,乃是郑、王之争的一种形态。

大小戴编辑《礼记》,取舍增删是有通盘考虑的。按刘向《别录》,记礼之文 204 篇,大戴删为 85 篇,小戴复删为 49 篇。经过大小戴的整理,《礼记》剩下了不到 1/4,且其中很多篇章都修订过。因为毕竟是将不同作者、不同学派,甚至观点可能相冲突的文章统合到一起,其编辑整理难度远远超过《家语》,中间出现一些疏漏,自是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将这些不同学派的文章整理成一个整体,必然已经体现出整理者自己的礼学思想体系,所以,他们取舍哪篇文章,如何增删,应当不是以“保存文献”的心态来做的,否则就会尽可能多地将文献收入书中,而是按照作者确定的礼学标准做的。大戴收入 85 篇,已经删去了一多半,小戴又删去了其中一小半,且将大戴中的许多文章做了大幅度的删改。而郑君遍注诸经背后的思想体系,虽然在琐细的经注中不易辨明,但已经越来越得到经学研究界的认可。<sup>②</sup>他之所以选择最后成书的《小戴礼记》作注,更是有三《礼》之间,乃至群经之间的总体考量。所以,今本《小戴礼记》绝不是一个大杂烩或拼凑的论文集,它之所以能够长期流传,与其选文精当、增删合理、结构严整、义理贯通的特点有莫大的干系。即使我们相信作为孔子裔孙的孔安国整理《孔子家语》,他主要的考虑是“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他整理的方式也是“以事类相次”,更多是为了保存文献,而非形成体系。王肃作注,常与郑君立异,自然有了更多经学义理上的考虑。他在《孔子家语序》中明确说了自己与郑学立异,是考虑到“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客观来讲,王肃的许多说法确实更符合古义,因而他与郑君不同的地方,却常常与马融相似。不过,《孔子家语》中既有支持王肃经学观点的许多材料,也有很多不支持他的材料,比如庙制,明显

① 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考》,中西书局 2015 年版。

② 乔秀严:《郑学第一原理》,《古典学集刊》,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49 页以下;李霖:《从〈大雅·思齐〉看郑玄解〈诗〉的原则》,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十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就更倾向于郑学的说法,由此可见,无论孔安国还是王肃,都没有在义理上系统整理《孔子家语》。两个版本的《礼运》之间的差别,除了文献流传的原因外,也和整理者的意图有很大关系。

### 三、大同小康辨

正是大同小康说,使《礼运》成为最重要的礼学文献之一,其对礼学演进的描述,蕴含着礼学思想相当根本的内容。如何理解此篇中的大同与小康,需要我们在认真审视《礼运》文本的基础上完成。

从邵懿辰以来,就不断有人认为《礼运》有错简,最终导致了对大同、小康说的否定,杨朝明仍然继续了这一理解。我们就先对照两个文本辨析,看大同、小康之说到底是否《礼运》中应有的内容。

《礼记》的文本:

昔者仲尼与於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家语》的文本:

孔子为鲁司寇,与於蜡,既宾事毕,乃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言偃侍,曰:“夫子何叹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

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则为己，力则为人。大人世及以为常，城郭沟池以为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选，未有不谨于礼。礼之所兴，与天地并，如有不由礼而在位者，则以为殃。”

郑注：“大道，谓五帝时也。”王肃注：“此谓三皇五帝时，大道行也。”二家并无异词。而邵懿辰说：“先儒泥一‘与’字，以大道之行属大同，三代之英属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其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与’字止一意，无两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谓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则有志未逮当作何解？”

《礼记》的“而有意焉”，《家语》作“而有记焉”，“志”即“记”之意，是记载的意思，并没有邵懿辰所说“徒想望”的意思，今人也很少由此论证的。但卢梅由“志”与“记”两个字认为，这里说的是三代而非五帝时，因为三代文献较多，五帝时没有什么文献。<sup>①</sup>以此论证这一段说的不是五帝时，应该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孔安国传《尚书》，今所传虽为伪书，但孔子至孔安国都不会认为五帝时毫无文献，以“志”和“记”论证孔子没有说五帝时，证据不足。

最关键的还是“与”字。邵懿辰认为“‘与’字止一意，无两意”，语焉不详，徐仁甫进一步澄清：“‘与’本训‘谓’，大道之行也谓三代之英，即‘大道之行也’说的就是三代之英，原本是一回事，汉人误解‘与’为连词，于是以大道之行为五帝时，以与三代之英并列，这样就变成两回事了。”<sup>②</sup>此后永良、杨朝明、卢梅等皆从此说。以“谓”训“与”，来自高邮王氏父子。我们且来看王氏父子是如何阐释这个字的。

《经传释词》卷一的第一个字就是“与”，其中确有训“谓”一条：“家大人曰：与犹谓也。”其例证有：1.《大戴礼记·夏小正》：“獭兽祭鱼，其比与之兽，何也？曰：非其类也。”“与之兽”，即“谓之兽”之意。2.同篇“与之室”，亦当训为“谓之室”。3.《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夫礼，大之由也，不与小之自也。”“与”为“谓”之意。4.李善本《文选》中的《报任少卿书》：“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王引之释：“言世人不谓我能死节也。”《汉书·司马迁传》作“不与能死节者比”，五臣本《文选》作“不能与死节者次”。王氏云：“此皆后人不能晓文义，而妄加增改。”<sup>③</sup>最后这一条，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已有讨论，同样引了《夏小正》的例子，另外又增加了两个：5.《韩诗外

① 卢梅：《〈礼运篇〉研究》，第23页。

② 徐仁甫：《〈礼记·礼运篇〉的误解与错简》，《晋阳学刊》1985年第2期。

③ 王引之：《经传释词》，凤凰出版社影印本第1卷2000年版，第6页。

传》：“子路与巫马期曰。”“与巫马期”即“谓巫马期”。6.《史记·高祖本纪》：“刘季乃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曰。”《汉书》作“谓沛父老曰”。<sup>①</sup>

王念孙举的例5、例6相当特殊，“与某某曰”解为“谓某某曰”，即“告诉某人说”，并非如《说文》释“谓”字所说的“论人论事得其实”的下定义之意，自然不可用来解“与三代之英”。《经传释词》中所收录的四条，确有以下定义的意思，这四处按照通常对“与”的理解，都会文义不通，只能解为“谓”。《经传释词》所收录的，本来就是助词很生僻的用法，“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sup>②</sup>。且由《汉书》与五臣本《文选》中《报任少卿书》的增字来看，古人是很少这样用“与”字的，以致无法理解司马迁的那句话。在上述六例之外，恐怕是很难再找出更多的用例了。但“与三代之英”中的“与”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完全可以训为“及”，孔子叹息，五帝时和三代的状况，自己虽然没有见到，还是有记载的，文义非常顺畅；但若训为“谓”，全句变成：“大道之行也，谓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自己提出“大道之行”的说法，然后又自己解释为“三代之英”，又说未逮与有志，颇为牵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用生僻而牵强的“谓”来训“与”，实在没有必要。

其次是“今”字，孔颖达说：“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称今也。”此说确不甚妥，所以邵懿辰抓住这个问题，说：“今大道既隐，以周为今犹可，以夏、商为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sup>③</sup>但邵懿辰并未提出解决方案。杨朝明更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大道既隐’的‘今’也不是‘现在’、‘当今’的意思，应该依清人王引之《经传释词》‘今，指事之词也’为训，强调的是‘大道既隐之后’。‘今大道既隐’泛指三代末世，既指夏、商末世，亦模糊包含有指孔子所处的时代。”<sup>④</sup>杨先生如此解“今”，比孔颖达和邵懿辰都要高明许多，反而与他自己所说的大同小康无别之说有冲突。按照此说，则夏禹之时为大同之世，夏桀之时为“今”，商汤之时又回到了大同之世，到商纣又到了“今”，文、武、成王、周公时回到了大同，自周衰到孔子时又是“今”，岂有这样混乱的古今观念？我以为，“今”确实不是简单的“现在”，而是泛指五帝之后的时代，也并不是小康时代，小康只是“今”的时代一个特别的时期（详见后）。

邵懿辰提出的其他理由都没有太大的力量，此不赘言。而今人否定小康说最有力的证据是，《家语》中没有“是谓小康”一句。卢梅说：“戴圣在编纂《礼记》时，不解文意，添入‘小康’等字，形成了今天的《礼记·礼运》。‘小康’最早见于《诗经》，其《大雅·劳民篇》说道：‘民亦劳止，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的小康之意为‘小安’。戴圣将‘小

① 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一》，凤凰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版，第328页。

② 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第2页。

③ 邵懿辰：《礼经通论》，页18b。

④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第33页。

康’提升为一个时代的名称置于《礼运》篇中,从而引发了后世学者的种种推断。”<sup>①</sup>此一点,《钦定礼记义疏》、任启运《礼记章句》、姜兆锡《礼记章义》等都曾提出过,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质疑,根本上还是在义理上难以接受大同小康之辨中类似于老庄之说的历史观,以及礼的非永恒性,但因为当时多数人相信《家语》是伪书,所以虽然多人有疑问,影响并不大,但今人在试图为《家语》翻案的时候,这一说法自然更有杀伤力。我们首先从两个方面来看“是谓小康”是否应该在文本当中。第一,从文字上看,“是谓小康”是否不应该存在?第二,从文义上看,“是谓小康”是否显得突兀。

从文字上看,《家语》本没有小康一句,是很多学者否定小康说的文本原因,但因为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家语》本一定在先,所以要证明《家语》本在文本上是正确的,必须证明“小康”就不应该存在于文本中。任启运和日本学者武内义雄都提出了他们的猜测。任启运认为,后文有“是谓大顺”之说,“大同”应与“大顺”并列<sup>②</sup>;武内义雄又认为,贾谊《新书》中将“小康”与“大康”相对,这才是更合理的文字。<sup>③</sup>

但细读《礼运》的两个版本,我们发现,在两个文本中,“是谓某某”的句式都贯穿了通篇,在《礼记》本中,不仅有“是谓大同”“是谓小康”,而且随后还有“是谓承天之佑”“是谓合莫”、“是谓大祥”(这三处《孔子家语》中无,这一段被编入《问礼》,只有“是谓大祥”,而杨朝明认为,《礼记》的编排应该是对的<sup>④</sup>)、“是谓大假”(《孔子家语》作“大嘉”)、“是谓幽国”、“是谓僭君”、“是谓胁君”、“是谓乱国”、“是谓君与臣同国”、“是谓制度”、“是谓天子坏法乱纪”、“是谓君臣为谗”、“是谓疵国”、“是谓大顺”等语,其中既有许多正面的说法,也有“是谓幽国”“是谓僭君”等负面的说法。在全文结束时,确实特别突出顺的概念,但还不足以使“大顺”成为与“大同”呼应和并列的概念,“大祥”“大嘉”等似乎都是类似的说法。因而,“是谓某某”是贯穿《礼运》全篇的句式,在“是谓大同”之后有“是谓小康”,在文法上完全是可能的。在所有这些“是谓”的句式中,只有首章的“大同”“小康”是在总括地谈礼之历史观,因而两者特别突出,而成为相互呼应的两个概念,并无不合理之处。倒是《家语》本中,“是谓大同”作“谓之大同”,似乎与其他的“是谓某某”相区别,而被突出出来,不大可能与“是谓大顺”相呼应。文中的“是谓某某”的各个句式参差不齐,不仅对仗不那么工整,字数也常常有多有少,“大同”未必对“大顺”,“小康”更没有必要对“大康”。从文字上看,“是谓小康”的存在完全是合理的。

① 卢梅:《〈礼运篇〉研究》,第21页。

② 任启运:《礼记章句》,乾隆三十八年清芬堂刻本,卷九之二,页22b。

③ 武内义雄:《〈礼运〉考》,收入内藤虎次郎编,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上),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08页。

④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第26页。